

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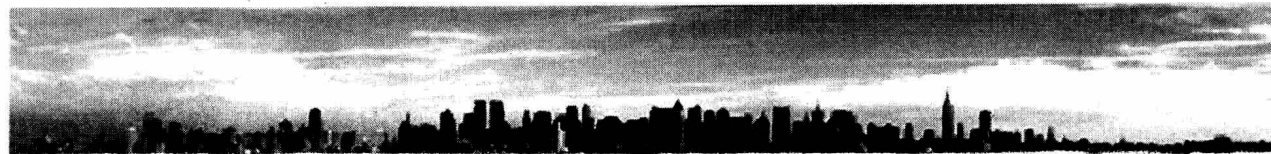
李强 著

白山出版社
BAISHAN CHUBANSHE

经 历

李 强 著

白 山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历/李强著. 沈阳:白山出版社,2008.9

ISBN 978-7-80687-606-0

I. 经... II. 李...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体-中国-当代

IV. I2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0007号

出版发行:白山出版社

地 址: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23号

邮 编:110013

电 话:024-23088689

电子邮箱:baishan867@163.com

策 划:方八另 龙国强 徐 强

责任编辑:孙福同

责任校对:李国宽

装帧设计:李慧锋 罗 伟

印 刷:长沙开福区山君印刷厂

幅面尺寸:240X170 1/16

印 张:18

字 数:230千字

版 次:2008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2008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687-606-0

定 价:29.80元

序

孟廣瑞

这是一位美国华裔移民的个人成长史，也是变迁的中美两国社会发展录。从个人经历看社会，从社会演变看个体，全书记录了一个普通人的点点滴滴，反映了历史进步的方方面面，印证着人类一个不变的规律：历史有人，才成其为历史；人有历史，才成而为人。

生活并不复杂，成功也不神秘，只要奋发进取，他能，我能，你也能！

李强医生来自武汉，他的故事谈不上轰轰烈烈，却有他的曲折。从事文学的人不多，业余从事文学创作的更少，都离不开个人的坚持和毅力。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主题曲有句话，“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若要问成功来自哪里，它就来自不懈的努力，因为努力本身就是成功！

美利坚是个文化多元的国家，历经风雨而一腔故土情结始终不变的华裔同胞，充满在这里的每个角落。李医生是他们中的一位代表。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坚持着以信念铺路，以血泪做墨，完成了这部文字记录——一笔一划地，用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块字，记录下自己的生活真实，执守着对土地、对家庭、对生存、对世界、对内心、对人类的思考。

这是一部通过历史，集文化、知识、教育、哲理、励志、政治为一体的书，更是一个炎黄子孙对故土那颗鲜红而又火热的心。美国有 300 万黄皮肤、黑眼睛的华裔，他们中许多人或其先辈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极尽所能为社会做贡献，同时又心系故土，关心大洋彼岸的每一寸发展。因为这群人身上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这种连接与生俱来，是不可能像电脑磁盘般一个格式化指令而全盘抹掉的。

李医生的工作告诉我们：只要不断努力融入生活的主流社会，同时承继和发扬好祖先遗留的优秀文化，就能更大地提高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丰富华人的精神领域，为社会进步添砖加瓦。移民的价值也会在岁月里得到进一步扩展。

美国历史台 (History Channel) 有一句广告词，“Any current reality is a living History (现在的每一刻都是活着的历史)”。这话很有道理。其实人也是如此！人的现在和过去密不可分，今天得到的一切缘于昨天的所有，你的家庭、你的

经 历


JING LI

社会、你的老师、你的努力、你的痛苦、你的经验、你的朋友……不要忘记了历史。
如果你想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让我们一起感谢过去,重视现在。

仅以此文为《经历》作序,我愿借此机会,祝更多华人同胞在不同领域生辉、
发光!

孟广瑞为纽约州首位亚裔议员

Preface



This is the personal history of a Chinese immigrant in the USA. It is also a record of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society. By using a person's experience to observe society, and using the improvements in society to reflect the individuals, this book documents a person's life and a country's development. It also confirms a pattern: history can only be made by people and people cannot exist without history.

Life is not complicated, and success is not a secret as long as one exerts himself. He can, I can. You also can.

Dr. Qiang Li comes from Wuhan. His story isn't heroic, but it is full of twists and turns. Very few pursue a career in literature, even fewer write creatively as a hobby. It takes a lot of will and perseverance to keep writing. There is a line from the theme song of the Chinese TV series 《The Monkey King》that says "Where is the road? It's under your feet". Success comes from effort and persistence because endeavor in itself is a part of success.

America is a country of many cultures. It is filled with Chinese American compatriots who have never forgotten about their native land through the tough times. Dr. Li is their representative. Using belief to pave the way and blood and tears as his ink, Dr. Li completed this written record in his free time one stroke at a time. Using the square characters passed down from his ancestors, he has recorded his own life as well as his thoughts on land, family, survival, the world, and mankind.

This is a personal history book that includes culture, knowledge, interest, education, philosophy, dedication and politics. More than anything, it is an expression of the feelings Dr. Li has toward his homeland. There are 3 million Chinese Americans in America. Many of them have traveled thousands of miles to come here and do their best to contribute to the American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have a special feeling toward their homeland by keeping

up with every bit of development overseas. These people have Chinese blood flowing through their veins. Their heritage cannot be erased as easily as the files in a computer.

The work done by Dr. Li tells us that if we work hard to integrate ourselves into mainstream society but still inherit and carry on the culture left to us by our ancestors, we can broad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round the world, and enrich the spirit of Chinese Americans and further our contributions to the society. The value of immigrants in this country will also greatly improve along the way.

The History Channel has an ad that says “Any current reality is a living History.” This is very true. The same can be said about people. Reality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past, and everything you have gotten is related to the past, such as your family, your society, your teachers, your friends, your colleagues, your efforts, your pain and your experiences. Never forget about your history. If you want a bright future, thank the past and value the present.

It's my pleasure to contribute to the preface of Dr. Qiang Li's book 《Experience》.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wish all Chinese Americans success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of work!

Jimmy Meng is the first Asian American New York State assembly member

目 录

中国篇

01. 坎坷童年(1960-1970)..... (2)
02. 广阔天地(1970-1972)..... (9)
03. 奋发图强(1972-1974)..... (13)
04. 走进延安(1974-1976)..... (20)
05. 教育改革(1976-1976)..... (28)
06. 一鸣惊人(1976-1978)..... (32)
07. 大学生活(1978-1982)..... (39)
08. 明日之星(1982-1983)..... (52)
09. 初露锋芒(1983-1985)..... (60)
10. 洋为中用(1985-1989)..... (66)
11. 福祸相倚(1989-1990)..... (77)
12. 主治医生(1990-1993)..... (86)
13. 谋事在人(1992-1993)..... (92)

美国篇

14. 走向世界(1993-1994)..... (100)
15. 访问学者(1994-1995)..... (113)
16. 好事多磨(1995-1996)..... (124)
17. 哀兵必胜(1996-1997)..... (132)
18. 特殊人才(1997-1998)..... (144)
19. 回归之路(1997-1999)..... (158)
20. 安家立业(1999-2000)..... (182)
21. 生意盎然(2000-2001)..... (194)
22. 祸不单行(2001-2002)..... (210)
23. 知足者富(2002-2003)..... (227)
24. 天有阴晴(2003-2004)..... (238)
25. 深情怀念(2004-2005)..... (259)
26. 望子成龙(2005-2006)..... (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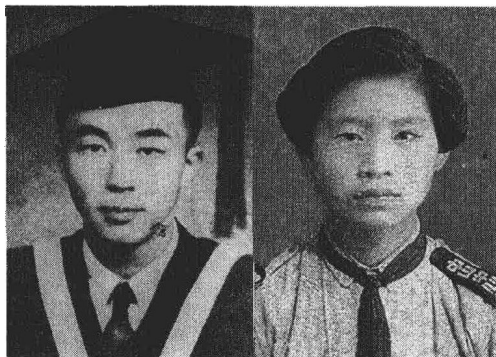
中国篇



我曾渴望做一名军人,在那个红色的年代,当兵是革命化的象征,而且军人总是伴随着英勇、无畏、自豪和伟大;我曾向往做一名工人,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里,他们给我以大公无私、无产阶级的形象,代表着正义、完美和崇高;我也想过做一名农民,那时的青年学生毕业后奔赴社会的第一条战线就是农村,而且即使是干部或知识分子也要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因此,农民当然是战天斗地、反修防修的化身,即使在时代变革以后,社会走向尊重科学和知识之时,我的理想仍未脱离当时的热门——成为一名科学家,因为只有他们才是距离现代化最近的“高尚”职业。当上医生,特别是一名美国移民中医师,可能有着某种命运的特殊安排。但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要发挥自己的能量,力争把它干好。过去我想过,我做过,我努力过,虽然曾经的那些梦想相继离我远去,但我却脚踏实地地走了过来,并且还要继续地朝前走下去,因为这已经成为了我的生活方式:除了追求,奋斗,我别无选择。

1. 坎坷童年 (1960~1970)

与许多中国家庭的孩子一样,我有一对充满爱和责任心的父母。父亲李楚兴是湖北襄阳人。因为学校少,离家远,因此从中学起父亲就开始住校读书。高中毕业后,父亲就读了国立湖北师范大学。在大学,父亲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参加过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爱国学生民主运动。1949年大学毕业后,经李先念创办的革命大学培训,父亲走上社会,在当时黄冈地委书记赵兴初领导下工作,并于1950年代初担任了黄冈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母亲张怀俊来自河南南阳。



父亲大学毕业照和母亲中学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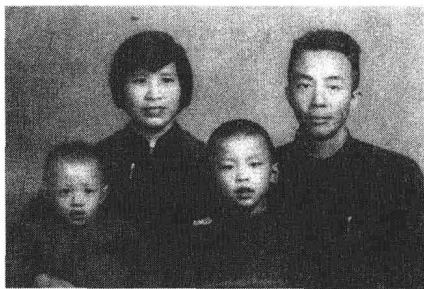
1951年高中毕业后,她独自跨省踏入社会,先后在黄冈县银行和妇联工作。后经介绍,父母相识、恋爱并结婚。1950年代中期,两人双双从黄冈调到湖北省委宣传部。文革前夕,又先后调到湖北人民出版社工作。自来到省委后,他们便一直住在了湖北的省会——武汉市。

武汉是华中地区最大的都市,城

区面积 800 多平方公里。世界第三大河流长江和最大支流汉水,将其分为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因与江水的密切关系,诗人李白留下了“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千古绝句,“江城”美誉得以闻名于世。在古代,从武汉循长江水道,可西上巴蜀,东下吴越,北溯汉水至豫陕,经洞庭湖南达湘桂,故有“九省通衢”之称。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攻城守城不绝于耳,关公、岳飞、石达开、叶挺等千古名将都曾屯兵在此。鸦片战争前后百年,这里又成为列强的抗衡之所,林则徐禁烟、张之洞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二七大罢工、北伐、国民党中央临时政府、“七一五”惨案、八七会议、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武汉保卫战等,无不与该城紧密相联。中国城市名前冠以“大”者,除上海外,只有武汉。此外,武汉热度也是全国驰名,被喻为三大火炉之一。而我在国内的许多日子,正是在这座“大”而“热”的江城度过的。

我原名洪浩,随母姓张,是 1960 年 10 月 26 日在武昌省直医院出生的。那时国内处于后“大跃进”、自然灾害和中苏决裂的困难时期,物资匮乏。据说当时全国粮食短缺和饥荒,百姓糊口都有困难,因此那年月出生的孩子身体底子差,易患病。我的童年的确如此。自得知毛主席生日在 26 日,我便产生了几分自豪。按民间说法“六六大顺”,老天爷选择吉祥的日子让我来到人世间。而我前半生的难忘事件中,恰巧好几次都发生在生日这一天。

我有个哥哥叫李利,小名毛子,是 1955 年 11 月 26 日出生的(也是 26 日)。也许源自发音吧,不知何时起,父母的同事和邻居们索性称我俩为“耗(浩)子”和“猫(毛)子”,这在有意无意之间就对我俩作出了褒贬,耗子可是四害之一呀!不过我俩性格是不太一样,哥哥听话、守纪律、学习认真、责任心强;而我活泼、淘气、散漫、脾气倔强。



现存最早的全家照(1960年代初)

哥哥长得像母亲,我像父亲。当时哥俩在父母单位和邻居中都小有名气,只是位于两极罢了。

过去的事,记不太多。据说我睡觉喜欢摸着大人耳朵,否则不入眠。我在幼儿园上过全托,每次送去时都嚎淘大哭,很远能听到。有时在幼儿园晚上看到萤火虫,会引起我无限遐想。在那儿我曾用苹果与小同伴换回一枚毛主席像章,被传为佳话;从手臂上疤痕得知,我因掀翻稀饭锅受过烫伤;小时候我常跟哥哥打架,有一次还把父母床架上一根柱子拉断了;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俩人一起嬉戏玩耍:我们家有一辆小三轮车,记忆中总是我在前面踩,他在后面推,然后他站在后

轮横杆上与我滑行；我们家后面有一条铁路，我俩常将铁钉放在铁轨上压“刀片”；我们也曾与父母一道，将煤渣加水捏成一个个煤球；我们家不远有个北湖游泳池，夏天我们常去那里，不过因为我不会游泳，只能站在浅水池边，看着哥哥和大人们在深水区酣畅地游来游去；有一年暑假，哥哥带我拿着板凳和渔竿去北湖钓鱼，坐上半天，虽钓到几条小鱼，却在回家途中把板凳给弄丢了。母亲知道后并没责备我们，而是将小鱼油炸给我们品尝；当时协和医院和武汉展览馆（简称武展）常放映露天电影，哥哥便带我一起早早地占上位子，享受一个晚上。记得我们一道在武展看过《海鹰》。《列宁在十月》则是从协和医院开始看，后来记不清又看过了多少遍。

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就在汉口解放大道附近的出版社宿舍。这里与武展为邻，马路对面是协和医院和中山公园。那时宿舍是栋二层红砖房，我们家住二楼，



笔者童年照

有两间单独地板屋。父母一间，我和哥哥一间。父母房里摆有双人床和书柜，五斗桌抽屉有不少我喜欢的连环画册。隔壁蔡学俭叔叔家孩子蔡星与哥哥同班。我和哥哥房间在另一侧，有两张单人床和长条桌，桌上放有交流电收音机，隔壁是厨房。斜对面刘清澜叔叔家3男孩——刘刚、刘良和刘军，年龄与我相近。大家常在一起玩，也闹矛盾。每当打斗时，总是哥哥出面，我在后面。有趣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直接接触，而是把扫帚、拖把等扔向对方大门。你来我往，直到失去兴趣。我们也曾与窗对面三楼家孩子乔乔发生冲突，起因是扔石子或射弹弓。每到夏

天，人们便把竹床搬到楼下后院乘凉、睡觉。因我们家厨房有一条木制楼梯直通后院，二楼住户基本都从这里下去，厨房似乎成了公共走廊。

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脑海里形象最为高大的还是一些英雄人物，特别像黄继光、董存瑞这类战争年代诞生的榜样。虽然当时还谈不上对未来有个明确的目标，但朦朦胧胧希望能够象他们那样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了国家而奋斗不息、大无畏捐躯似乎是一个最为自豪的人生，因此“勇敢”成为一段时期我最为崇敬的字眼。究其原因恐怕还是与大人和社会的英雄主义熏陶有很大的关系。

我的学生生涯开始于武汉市解放小学。学校原名友好宫小学，因靠近中苏友好宫而得名。该宫是中苏两国蜜月时，苏联专家设计，建成于1950年代，被视作友谊的象征。后因两国交恶，中苏友好宫改名武汉展览馆，学校也更名解放小学。哥哥在这里上学时，担任过少先队大队委，参加了市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做过少先队举旗手，还得过许多奖状，是父母单位和左邻右舍家喻户晓的“人

物”。轮到我进校时，全国已进入文革。除参加庆祝党代会和支援亚非拉革命活动外，我印象最深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那时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或“最新指示”，每当“指示”发表，不分昼夜，马上举行游行。由于看游行的人特别多，马路两边全被挤满，因此占位十分重要。记得哥哥有个同学家住解放大道马路旁二楼，从他家窗户看游行一目了然，令我们羡慕不已。每当游行车队“救火龙”从解放大道上疾驶而过，两边车门外站着头戴钢盔、手持红缨枪的“造反派”，看上去威风凛凛，煞是气派。

“造反派”是文革产生的群众组织。它们有不同名称，派系之间也有斗争，但都是最坚决最衷心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及其首脑机关（如国务院、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的领导，却又大造各地方党委（省市县委，企业、机关单位党委）的反。它们冲垮了当时中共地方组织，使其处于瘫痪状态。

文革时教室布置基本一样：黑板上方中央贴着毛主席像，左边“好好学习”，右边“天天向上”，多为毛手写体。侧面墙上一般贴几张文字印刷品，如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学校主要对我们进行政治灌输：早上提前半小时到校“天天读”，即集体朗读毛的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时称“老三篇”，很多同学都会背。当时因争抢背诵老三篇速度，有两位同学还反目成仇；上课前，大家把长条凳往桌下一推，对着毛主席像跳“忠字舞”。这个舞为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而设计，那时非常流行。然后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的口号；我们上课用的课本封面印有毛主席语录，课堂内容也是以学习毛主席语录、诗词或相关内容为主，非常单一。但因受到社会气氛的渲染和舆论导向，人们似乎对此非常适应和热衷，唯恐成为“落后分子”。

学校也组织我们参观政治教育展览，武展展出的大型泥塑《收租院》当时非常有名，它刻画了解放前四川大邑县地主刘文彩对农民的残酷压榨和剥削，其解说词还入选了小学课文。泥塑有真人般大小，形象逼真。地主大斗进小斗出，农民交不起租，便被关进水牢，甚至被塞住口鼻往肛门打气，直到肠胃涨破而死的场面给我刺激很大，使我对地主产生了满腔仇恨。刘文彩和他的庄园因此也恶名远扬。《收租院》的歌流传甚广，其歌词是：“收租院是鬼门关，交租好比上刀山。过了一关又一关，一关更比一关难。”后来有的同学把词改编后，用来讽刺文化课考试。

学校把父母单位同年级孩子分在一个班上，刘良、汪汉、祝超超和吕小章等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吕是宿舍同学中唯一的女生，其父吕庆庚曾经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而我的同桌正好是邻居刘良。他脑袋圆圆的，看上去很机灵。另

一个同学脑袋形状很特别,前额大,后额突出,我们叫他“霸脑壳”。他点子多,坏主意也不少,不过大家都还玩得来。

在校内我未担任职务,也没得过先进。放学后,倒是被安排做过路队长。学校把住在一起的同学集中分成路队,放学后由队长带领,一起出校门。到某位同学家门口时,该同学才可离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做“领导”工作,至于老师出发点是为了约束我的自由散漫,还是认为我有能力管好路队,已无从考证。

校内生活单调,体育和娱乐设施奇缺。放学后,一些自产自生或成本低廉的传统活动,吸引了不少小伙伴们。象打撇撇、拍糖纸、挑冰棍、跳绳、捉迷藏、滴扣子、跳房、打弹珠、打陀螺、弹子车、拱擂子、官兵捉强盗、丢手绢、跳山羊、漂洋画、太平洋、丢沙包、滚铁环、踢毽子、放风筝等等都是当时的流行游戏。它们给大家以快乐,也充实了我们的童年生活。

就拿当时我们男生十分喜爱的“滴扣子”来说吧,什么样的钮扣都可以加入,可谓五花八门。将钮扣放在地面砖头上,凹面朝下,凸面朝上,然后用手中的钮扣对准目标松手落下,能够将其从砖上击下者最为成功,或者先将其掀翻,再朝扣子边缘“滴”去,就容易多了。我当时最喜欢的是大衣的黑色钮扣,面积大,底盘重,很难从砖上被“滴”下,用它来“滴”小钮扣就要轻松许多。有一次我居然一连击下对手四五个。不过对付这种大钮扣我们也摸索出了一些经验,将自己的钮扣高举过头,通过高度增加力度,松开钮扣时,用力跺脚,大喊一声“下”,有时还真管用,“大块头”竟然被“轰”了下来。要说成本最低,条件要求最为简单的还数捉迷藏、拱擂子、跳房了,这类游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能进行。有次我们分边“拱擂子”,我方把对手全部击倒,竟无一人受伤,创下了当时的一个“奇迹”。

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紧张,到处张挂毛主席指示,“要准备打仗”、“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落实指示的重大举动是挖防空洞。利用防空洞玩耍,成为我们那一代的又一个发明。挖防空壕时,是“跳”,即跨越壕沟,姿势等同助跑的跳远;建防空洞后,是“钻”,类似抗战时的钻地道。这些可以称之为特殊时期独有的游戏了。

此外,“文革”街景也颇具时代特色。归纳来看,可分为“文”、“武”两类。“武”表现在前面提到的游行、街头巷尾穿行的大喇叭“宣传车”以及撒、捡传单。文革时兴穿军服、戴军帽、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抢(时称“飞”)军帽和毛主席像章也时有发生;“文”则是出租小人书,我们宿舍周围有些路边地摊,前面码几个小板凳,架子上摆满琳琅满目的小人书。租一本一分钱,有个一角八分的,就能在书摊耗上一个下午。路边修鞋匠和废品收购点,也给人某种时代的印记。当时商店没啥零食,街头小贩的叫卖和服务倒挺有特色,“磨剪子、镪菜刀”的吆喝和收垃圾

摇铃声构成街景组合一部分。有些零食，象炸米泡、画糖、敲糖、搅糖和棉花糖等，特讨小朋友喜欢，而且生意灵活，牙膏皮、桔子皮、铜和铁都可代替货币使用。

童年时代固然不乏趣事，不过印象最深、对我早期成长影响最大的还是“反标事件”，它在一段时间里左右了我的人生轨迹。父母说从那以后，我的性格开始发生了很大变化。它让我心中曾经拥有的那份“英雄”理想也几乎消失殆尽。

记得是在1968年秋冬时节一个晚上，父母到湖北省出版纸张仓库（简称纸库）参加学习班，哥哥照顾我已上床睡觉。不知过了多久，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几位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大人把我叫了起来，直接带到派出所二楼小房间，并指责我书写了“反动标语”。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吓呆了，不知所措。母亲半夜回家得知消息后，赶来派出所，刚刚推开房门便被挡了出去。这时除了不停地流泪，我没有了任何反应。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大都知道，毛主席当时被宣传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应该“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谁敢反对毛主席，就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就砸烂谁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书写“反标”可是弥天大罪。父亲同事万迪淦叔叔的儿子就是因为书写“反标”，被送进监狱而葬送了一生。据说当时读中学时，他与同座同学有矛盾，为了报复对方，便在同学教材上写下了“打倒毛主席”几个字，后来查出是他所为，被判10年有期徒刑。

然而在派出所这样的执法机构，对于我这么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成人的威胁是有效的，诱导也是成功的。得到“承认错误，就可以回家”的承诺后，我包揽了所有强加的罪责。

被迫供认所犯“错误”的当天深夜，我被带到事发现场。在手电筒光照下，我目睹了“反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犯错事实”。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但给我印象极深。原来在一排长长的大字报专栏里，不知谁用红油漆在三处写有“毛主席”的字面上划了叉，一处在上，两处在下。这时我想起，白天曾与几个宿舍内小朋友，在附近砖堆处玩过“捉迷藏”的游戏。手指三处叉叉，“确认”自己所为后，我被送到父母单位办公大楼内留宿而未被送回家，实乃受到欺骗。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当时是谁在陷害我，出于何动机。

“反标”使我名扬学校，成了特殊学生，因为全校“敢”书写“反标”的仅我一人。我心理压抑极了，感到仿佛所有同学都在背后议论。失去了朋友，也没有了欢笑，我的生活开始一步步走向黑暗。为了配合父母单位对我的教育，学校开始了对我的特殊“关照”。每天放学后，我必须到学校顶层通往阳台的房间里作检查，写交代，尤其是幕后指使人更是追查的重点。压力下，我总是胡编乱造一通。但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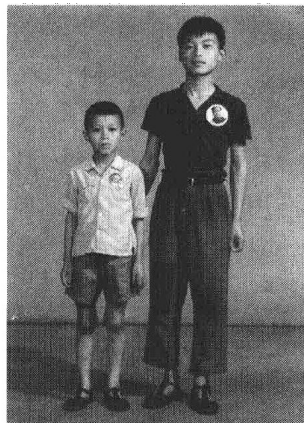
难以自圆其说,又加以否定,最后只得咬定无人指使。我也曾试图翻供,结果证明完全不可能。那时楼房不多,透过学校顶楼窗户,可以看到武汉长江大桥。当夜幕降临时,桥上排列有序的点点灯光,给了我几分心灵上的慰藉。

不久,父母单位为我和另外一位职工子弟办了“学习班”。父母同事冷少卿叔叔的侄儿,也因“政治错误”被列为“教育对象”。于是我俩被关在父母单位办公楼三楼一间小房中。同病相怜的两个小伙伴没有歧视,同吃同住,建立起特殊环境下的友谊。当然也少不了一同接受“军代表”们的调查和“帮助”。相对而言,这里“学习班”的环境让我感觉要好一些。不过因为另外一件事,我俩后来还是被分开了。

不知是否与和这位小伙伴住在一起心情转好有关,我的饭量增加了,一小碗似乎不够吃。他比我小,吃得也少些,便每次把饭分给我一坨。上面知道后,严厉批评了我这个“剥削者”,同时认为不能发展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于是将我俩分开,从此我再度进入一个人的世界。当我从出版社大楼三楼窗户,看到小朋友们在院内自由玩耍时,心里羡慕极了:“能够回到他们中间,该有多好啊。”

在人生本应充满快乐的年纪,遭受如此打击,我变得沉默寡言,逆反暴躁。当时唯一的依靠是自己的家人,父母给了我无限的温暖。在和我相聚时,他们向我了解事情经过,得知我被迫承认“错误”后,便找机会与我谈心,帮我调节心理,减轻压力。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也许是他们能够尽到的最大努力了。

北湖劳教所位于武汉郊外,是专门用于关押犯人的地方,不知什么原因,父母单位的“军代表”决定把我送到那里——一个令我最为讨厌的地方,集中“学习”。那时外面已下起了大雪,天气十分寒冷,父母、哥哥还得轮流为我送饭。和那些犯有错误的“大人”,甚至刑事犯们关在一起,让我感到沮丧。好在我当时年龄不大,否则真要从他们那里学些坏东西,还是很可怕的。记不清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学习班”终于结束了。当父母、哥哥踩着三轮车接我回家时,我心中充满了兴奋。坐上三轮车,行进在白雪皑皑的马路上,我感到十分满足。亲人的关怀,让我忘却了冬天的寒冷。



“反标事件”后与哥哥的合影
(1969年)

孩提时代是人生的启蒙阶段,有时命运也会将人推向风暴的漩涡。是悲是喜,是祸是福,有时要用一生的成长去评判。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好的木材并不在顺境中生长。风越强,树越壮。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比我早年处境悲惨的人多的是,只有放平心态,吸取教益,困难坎坷才能成为未来生活的教科书。

2. 广阔天地 (1970~1972)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封信。在信中,毛主席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就是文革中影响深远的“五七指示”。1968年5月,黑龙江革委会纪念“五七指示”两周年,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个500名省直机关人员参加劳动锻炼的农场。10月5日,《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为题整版报道,并在编者按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随后各地机关和文化部门陆续选择偏远、贫穷的农村办“五七干校”,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开始下放劳动。父母单位出版系统也于1970年成立了“五七干校”。

1970年10月,得知父母决定全家随单位下放“五七干校”后,我颇为高兴,原因当然与“反标”有关。当时我想只要能够摆脱这里的环境,什么地方都愿意去。父母出发前准备工作很简单,因为除书桌、凳子、书柜、箱子和床外,我们家没有了其它财产。离开江城的头天晚上,所有东西打了包,我们睡在地板上,这是我首次睡地铺。次日凌晨天蒙蒙亮便起了床,生平头一回搬家,心情激动,当我坐在卡车车厢挡板处的小方凳上时,睡意全部消失。在飞扬的尘土里,随着城市楼房和柏油马路的渐渐离去,我感觉似笼中小鸟回到大自然般的惬意。经过七八个小时颠簸,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沔阳县口河区口河公社口河大队三小队。下车后,当父母和哥哥忙于搬运行李时,我已窜到离家不远的泥塘里,和农民孩子一道捉泥鳅去了。为此失去了父母单位给我们全家,在“新居”门前合影留念的难得机会。

沔阳位于江汉平原腹地,土地肥沃,地势平坦。过去因为水患不断,导致“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1958年丹江口水利枢纽建成后,水患得到控制,不过生活条件仍然很差。虽距武汉不足



父母、哥哥在农村“新居”前合影 (1970年)